

#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

季 鹏

---

---

**内容提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开始了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始武装抵抗。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和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形式培训部队各级干部,并分拨到各部队去训练士兵,使士兵尽快获得正规的军事知识;对前线和后方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训,加强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激发爱国热情和提高作战技能。强化军事技能训练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士兵自身的素质得到提高,部队持续战斗力得以增强,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后来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政治训练的效果,再加上军事训练时间紧迫且主要局限在西南地区,因此士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养成的预期目标远远未能达到。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国统区 军队 政治训练 军事训练

---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大敌当前,国民政府亦指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责任”,号召全国人民全力投入对日战争。因国民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不敢真正发动人民群众,导致国民党军队一败再败,大片国土相继沦丧。面对现代化的日军作战,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将部队分为前线和后方两大部分,分别进行整训和编补。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和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国民政府加强了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如选训干部,分拨各处,使士兵尽快得到正规的军事知识;加强

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和提高士兵的作战技能等等。经过严格的士兵养成教育,士兵自身素质得到提高,对日作战能力明显增强,但因国民政府后来实施积极反共、消极对日的抗战政策,再因时间紧迫,士兵养成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 一 干部训练

全面抗战后,急需培养大批军队干部,以训练指挥新兵。时干部训练主要以陆军为主,分为学校教育和部队训练两种,抗战时期,二种训练并行。

学校教育为建军的基础,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办理,分为初级军官养成教育、中级军官专科教育和高级军官深造教育三种。抗战之初,国民政府令中央军校成都本校增加学生总队,并于各战区成立9个分校,设3个干部训练班驻江苏、河北、山东等省。因战时所需,除本校第一总队为二年以上长期教育外,余均缩短教育时间,迅速毕业分遣。截至抗战胜利,计培养初级军官120215人。为培养中级军官,提高部队素质,中央军校本校设高等教育班,各分校设军官训练班,分期召训行伍军官;各兵科学校,除正规班次外,分期召训各兵科军官。抗战期间,先后召训各兵科中级军官共约10万人。<sup>①</sup>全面抗战开始后,需要大量高级指挥官,政府决定将陆大正规班、特别班修业期间缩短。为扩大训练参谋人员,还成立了参谋补习班,并作如下改进:调整陆大课程内容,以增进参谋学识;统制学员分发,以建立参谋系统;充实陆大研究院,以养成陆

<sup>①</sup>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2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8年版,第106、107页。

大师资;减少次要课程,以加强重要课程等。为储备国防建设干部,1942年12月,国民政府特设国防研究院,选拔国内外陆、海、空军各大学与兵科学校毕业的优秀军官为研究员,从事国防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研究。第一期研究员共38人,于1944年1月毕业后,又选派10人往英、美、苏等国继续研究。<sup>①</sup>

部队训练主要由1938年2月成立的军训部主持,为实施整训,军训部陆续颁布《战时整编部队教育纲要》《战时教育训令》《战时军队教育令》《督导实施办法》等法规。为了借助盟军教育经验,军事委员会还在广西桂林和云南昆明两地,设立东南和西南干训团,采用美式教育,并选派军官前往美国于印度蓝姆伽(Ramgar)主办的军校,接受战术训练。蓝姆伽训练营从1942年8月开始,由史迪威任训练营长官,罗卓英副之,转入印度的中国官兵9000余人移至蓝姆伽,改称驻印军(又称“Y”部队<sup>②</sup>),接受美式训练与装备。蓝伽训练营以训练炮兵和步兵为主,着重于使用火炮及重武器训练,以便日后担任云南训练30个师的主要干部。1944年,军事委员会设立9个督训处,实施分区督训,先从战区干训团、军干班着手,再及于各部队。后因战局演变,将9个督训处,减编为5个,将各战区干训团,合并为军事委员会驻滇干训团,以及西北、东南、江北各干训团,各战区不再设干训团。<sup>③</sup>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除采用多种方式训练各级干部外,为适应战时需要,还专门训练了游击干部和兵役干部。

1938年冬,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

①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2卷,第107页。

②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湾环球书局1987年4月版。

③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2卷,第108页。

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sup>①</sup>的建议,蒋介石采纳后立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为适应抗日游击战的需要,培养大批有力的、坚强的游击干部深入敌后,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以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游击干部训练班最初主要招收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进行集中训练,并要求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加训练,毕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班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伍,到敌人的后方和侧面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干部训练班第1期招收学员1046人,第2期530人,第3期1459人,1940年夏第4期刚招收入学,即遭日机轰炸,遂移至湖南祁阳结业,以后又在江西修水办了第5、第6两期,在浙江丽水办了第7期,七期共毕业学员5659人。<sup>②</sup>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为国民党训练游击干部、扩大游击队伍、开发敌后根据地并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从整个战争进程来看,国民党游击战开展得并不出色,而且游击区的游击训练也没有收到太大的实际效果,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场也始终没能发挥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进攻的作用。

抗战爆发后,为了扩大各省兵役业务,加强对《兵役法》<sup>③</sup>的宣传,国民政府成立了江苏等9个兵役管区司令部,以省保安司令部兼兵役管区司令,负责管区内的役政建设。而后兵役管区几经

①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湾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编印,第353页。

② 《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第123页。

③ 为了扩大战时兵员,保证部队有充足的兵源,国民政府改变过去的招兵办法,于1933年6月17日公布《兵役法》,宣布从1936年3月1日起实行新的招兵办法——征兵制。《兵役法》规定: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义务,男子自年满18岁之翌年1月1日起役,至届满45岁之年12月31日除役。

增设,到 1943 年 7 月,全国共有 16 个军管区,112 个师管区,1 个师管区筹备处,1 个征募事务处,16 个征兵事务所。<sup>①</sup>为推行《兵役法》,国民政府特别开办了兵役干部训练班。早在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曾在南京开办了两期军政部兵役实施人员讲习班,召集各师、团管区司令,师管区筹备处长以及其他人员参加集训,旋因抗战全面爆发,战事繁杂,讲习班被迫中断。1939 年 9 月,国民政府恢复了兵役干部训练班,到 1945 年 8 月,先后在重庆开办了 16 期(即第 3—18 期)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sup>②</sup>此外,国民政府还在各地举办了地方性的兵役干部训练班。地方兵役干部训练班分省、县两级进行。省级兵役训练班主要训练国民兵团团附与各级中、分队长及县政府军事人员,训练期限为 3 个月;县级兵役训练班训练乡(镇)保队长、队附及班长,训练期限为 4 个月。被召训的兵役干部,在回到其所管辖的军、师、团管区后,对国民党的征兵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对抗战时期征调兵员、补充新兵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带有很大的强迫性,加上各级役政人员的腐败,兵役干部的训练后来也多流于形式。

## 二 政治训练

政治训练历来都是部队训练的重要内容,是确保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1938 年 3 月 15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训令,指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提高部队革命精神,以巩固革命阵营,完成革命使命,特于陆、海、空各部队、各军事学校设置各级政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抗战六年来之军事》,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3 年 7 月版,第 12 页。

②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 2 卷,第 115 页。

治部主任及团连指导员,各军医院派遣监理员”。<sup>①</sup>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进一步明确要求,“加强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sup>②</sup>1938年底,军事委员会颁布政治部工作决议,规定各战区及行营政治部都必须创办阵中日报社一所,各师出版油印不定期《阵中日报》一张,各部队设流动书店。<sup>③</sup>决议还规定各部队要宣扬政治训练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政治训练工作,就不知道抗日和革命的真义”。<sup>④</sup>

为加强对部队政治训练的督导,国民政府在组织上调整了政治训练机构。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宣布改组,将大本营第六部、军委会政训处、训练总监部、国民军训处等单位,合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陈诚、张治中先后任主任,掌管“陆海空军的政治训练”和“国民兵的政治训练及精神教育”。<sup>⑤</sup>5月,国民政府在各地普遍成立各行营、战区及后勤、宪兵、航空等单位政治部,同时将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确立了部队的政工组织系统,以开展部队政治训练工作。1941年夏,军政部虽下令裁撤了各军政治部,却增设了连级政治指导员;规定各级政工主管均由部队副长官兼任,或由政工主管兼任部队主管,以增强政工主管的职权,冀图“将北伐时代的党代表功能,在抗战期间发挥出来”。<sup>⑥</sup>

① 《政治通讯》(创刊号),第31页,1938年6月10日。

② 宋玺:《中国国民党政训政策的演进》,台湾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56页。

③ 陈诚:《关于政治部今后工作之讨论与决议》,《时事类编》第29期,1939年1月。

④ 陈诚:《关于军队政训工作之指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第12页。

⑤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40年6月14日核准颁行,载《国家建设丛刊》第4册,第155页。

⑥ 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时期军事报告书》,《民国丛书》第二编(32),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70页。

部队政治训练主要以《政治训练令》、《政工纲领》、《政工典范草案》、《前方部队政治工作实施办法》、《后方整训部队政治工作实施纲领》、《补充兵政治工作实施细则》、《游击部队政治工作实施纲领》、《军事学校政治训练计划大纲》等法令为依据,一是针对中上级军官,一是针对连队广大官兵。中央训练团负责对中上级军官的训练,中央训练团直属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由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改组而成,蒋介石亲自任团长,下设大队部、教育委员会、办公厅等机构。整个抗战期间,中央训练团共举办了各训练班18种,以党政训练班为主,先后共有23000余名党政人员参加了受训。<sup>①</sup>对连队广大官兵,主要是通过个别训练和小组训练的办法,有时也举办时事报告和座谈会。个别训练主要由连队政治指导员通过考察士兵的心理和生活状况,然后举行个别谈话。小组训练则以小组会议为主,将士兵与军官分别编组,然后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

政治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广大官兵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军人士气,倡导坚持长期抗战。通过政治训练,要求广大官兵明确“保国为民”的神圣职责,“以深刻的政治认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动的恪守纪律,遵守人格,积极地为全民族努力,为国家牺牲”;要求广大官兵“一切从本身做起”,“平时刻苦耐劳,以身作则;战时冒险犯难,身先士卒;对于学问要研究,要求进步;对于人格,要求多加修养;对于个人生活,在物质方面要尽量节省,减少最低限度的欲望;在精神方面,要把革命当作一种最愉快的事,不成功便成仁”。<sup>②</sup>对政治工作人员和政治训练人员,更要求“部属集体化”,“生活士兵化”,“工作学术化”,“行动军事化”,与部队

① 赵普炬:《中央训练团梗概》,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

② 陈诚:《关于军队政训工作之指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第13页。

长官互相配合,真正达到指臂相使的效果。

### 三 军事训练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的国民党陆军一共有 182 个师,48 个独立旅,6 个炮兵旅,20 个独立炮兵团。以后,随着战事的不断发展,国民政府又大量增兵。到 1943 年 6 月,国民党陆军已增至 300 个师,连同各补训处、各兵役机关的补充兵在内,共约 600 万人。<sup>①</sup>可是,这些军队许多都是由新征募来的未经训练的新兵组成,战斗力极差。为了增强这些新老部队的战斗力,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国民政府在加强对部队政治训练的同时,也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训练。

首先,分期整训部队。为了长期抗战,加强部队作战力量,1938 年 11 月 25 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制定了《国防军整理方案》,预定在 1939 年内,将各作战部队分期整理完毕。前后列入整理的部队共有 74 个军,198 个师。军、师数各占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二。但是,由于广州、海口被日军封锁,截至 1939 年 10 月,仅完成两期<sup>②</sup>,共整训部队 66 个军。<sup>③</sup>以后,国民党继续进行部队整训。

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时期,军训部针对过去国民党军队教育“拘守成规,不求进步,以为临战能冲锋陷阵,即可克

① 白崇禧:《中国军事教育现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 1943 年编印,第 3 页。

② 黄埔建国文集编撰委员会主编:《黄埔六十年》,(台湾)实践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9 页。

③ 郝柏村主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6 年版,第 939 页。



敌致果”的现状,决定于贵州扎佐建立陆军演习场。这所演习场规模极为宏大,专供陆军实习与参观使用,同时在各军事学校召集干部专心研究。另颁发《战时整编部队教育纲领》、《战时军队教育令》及《军队教育手册》等,使官兵了解现代带兵、练兵的要诀。为使各部队每一级军官确实具有该级在战场上应有的学识技能,国民党军队又开展了阶层教育,于1943年颁行《军队阶层教育实施方案》,内分“实施纲要”、“实行细则”、“考核办法”三部分,并选定各级官兵特应实习的课目,顺次编成,以达到各级官兵本位学术教育的目的。

除了正规部队外,国民政府还对补充兵进行了编练。1939年间,先后在川、黔、闽、粤、湘、鄂、赣、豫、陕、甘等省,设立27个补充兵训练处,统一训练补充兵。翌年,为调整各师管区补充团,又陆续新增第28至第46补充兵训练处。截至1941年2月,各师管区有后方补充团35个,各补充兵训练处共有装备团35个,野战补充团12个,后方补充团173个,共计255个团。<sup>①</sup>自1941年起,为配合调整补充部队,军训部又将新成立的学兵队裁撤,编为各“后方补充团”的第一连分别进行军事训练,以备补充前线的战斗部队。

其次,考核督训部队。为促进部队教育、考核训练成效,1938年,军训部曾分两次施行校阅。第一次于4月中旬开始,派遣校阅专使陈继承率同校阅主任5人,分赴河南、陕西、湖北等省,校阅驻扎后方整顿的部队,共37个单位。嗣后正拟继续校阅赣江以西、湘粤桂等省驻扎整训的部队时,适逢九江战事吃紧,遂暂行停止。第二次于9月中旬开始,分总务、战斗、工事及后方勤务等组,专事校阅武汉卫戍部队9个师,适因武汉战事激烈,仅将第一八五师校

①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2卷,第119页。

阅完毕。1939年,为使各部队明了本年度整训部队的教育程度及战斗力量,军训部又于1939年5月举行总校阅,计分6组,分赴陕、豫、川、鄂、黔、桂、湘等18个军(44个师)实施校阅,军训部长亲赴粤、桂、湘、赣、浙、闽等省视察。为使各部队教育进度和教育方法一致,军训部又于1944年在战区设置9个督训处,至1944年,共督训了60个军、6个师、7个独立旅。<sup>①</sup>另外,为使各战区各部队熟悉各兵种战斗起见,军训部又组织游动教育班,1939年8月首次在陕西五原施教,以后有赴西宁施教,参加受训的人员多为该地驻扎部队干部;接着组设“西北巡回教育班”,以补充各部队干部战斗技术的不足;同时,又责成各战区设立干部训练团,召集本战区各级干部施以短期教育,除学员队和军士队外,尚有步兵炮兵协同训练班、通讯训练班、作战人员训练班及机关炮、步兵、炮兵射击技术训练班等,按兵科的需要,所设班次不等,教育期限亦略有差异。

再次,国民党在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练兵活动。1942年初,由于美国先进装备大量输入,为使部队学会使用美械,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决定在西南扩大练兵。3月,军训部拟订了一个用美械装备30个师的训练计划及装备表,决定在云南昆明设立步兵、炮兵、通讯兵、交通兵训练中心,期满后回原单位,任训练班教官。该计划很快被蒋介石批准。1943年4月1日,昆明步兵、炮兵训练中心同时成立,都是仿效美国国内训练中心的组织,其中炮兵训练中心由美国人瓦斯特主持,有56名教官,12名中国助教和13名翻译官。但在开课前往报到的,只有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炮兵团的40名军官和248名士兵,这只占预定学员数的1/4。步兵训练中心由美国陆军准将阿姆斯主持。最初两班学员是第五军干部训练

<sup>①</sup> 郝柏村主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第942页。

班学员,都不是正式军官。1944 年,魏德迈来华后,军训部决定在昆明成立军事训练中心,包括参谋学校、步兵训练中心、野战炮训练中心、驾驶及修护训练中心、军需供应训练中心等。1945 年 4 月 1 日训练开始,抗战胜利随即结束。

第四,接受国外训练。中国赴印度远征军成立后,在蓝伽训练营接受美式训练,到 1944 年 1 月训练完成,受训结业的中国军官有 2626 人,士兵有 29667 人。<sup>①</sup>这些人共编成新编第二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师、新编第三十八师,后来又扩编为新一军及新六军。

抗战期间,海军历年损失虽重,但对战力重建,未尝稍懈。1941 年开始海军重建工作:选派海军官校毕业生 20 人,赴英、美学习领航轰炸;考选海军官校毕业生 99 人,赴美接受盟军作战训练;选派造船工程师 23 人赴美,12 人赴英,学习造船;成立海军军官训练班,选拔海军军官 150 人集中训练,以作为重建海军的中坚力量。<sup>②</sup>

战前空军教育方针为不求人数激增,但求技术精进,抗战开始后,空军教育训练遂改变原方针:将学校教育时间缩短,增加人数,寓训练于作战中。1941 年美国实施对华租借法案,除以军用物资援助中国外,并遣“军事援华团”协助中国训练军队,并决定在美国训练中国飞行与机械人员。是年第一批中国空军学生开始在美国阿里桑那州受训,其后陆续有学生赴美接受训练。1942 年 3 月,中国征得英国同意,将空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与第十一等大队,分批调往印度,由美国代训<sup>③</sup>,后接受新机回国作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 10 卷,第 67 页。

②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 2 卷,第 109 页。

③ 蒋纬国总主编《抗日御侮》第 2 卷,第 113 页。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出于战争长期化的考虑,在国统区大力推行士兵养成教育。在干部训练方面,国民政府既推行学校教育,又开展部队整训,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一批军事过硬人才,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在士兵自身素质训练方面,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强化军事技能训练,不仅培养了国力,且能保存持续战力,对抗战胜利起到积极作用。但抗战时期的士兵养成教育仍有诸多消极因素,如向士兵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思想,强化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地位等,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国民政府的抗日出现了动摇反复,致使其思想教育中,出现了许多反共内容,降低了国民党军队政治训练的效果。再如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训练主要局限于西南地区,此举大大影响了抗战力的培养和发挥。

(作者季鹏,1948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